

上海：党的诞生地系列研究丛书

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

苏智良 / 主 编

姚 霏 张玉菡 / 副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上海：党的诞生地系列研究丛书

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

苏智良 / 主 编

姚 霏 张玉菡 / 副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 / 苏智良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7

(“上海: 党的诞生地”系列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4-9161-7

I. ①人… II. ①苏…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上海—文集 IV. ①D235.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9387 号



责任编辑 林凡凡

封面设计 郑 艺

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 RENWU · SIXIANG YU ZHONGGONG JIANDANG

苏智良 主编

姚霏、张玉茜 副主编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75 插页 1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9161-7/D·0116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上海市哲社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历史信息数据库及数字化地图”中期成果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高峰高原学科规划项目成果

序言：追忆建党先贤的上海事迹

苏智良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角，历史研究不能缺失历史人物。同样，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史研究来说，参与中共建立的那一批最早的革命者们，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与这一批先行者们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这座城市的许多建筑、里弄、工厂、学校、街道，都是他们革命生涯的见证。但对他们在上海的革命活动，纵使成果已丰，总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通透，总还有很多细节有待挖掘。

2018年6月30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市历史学会在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会议将主题定为“近代人物与中共建党”，就是希望能以新的史料、视野和方法，来深入挖掘革命人物在上海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所开展的种种活动，希冀展现出一幅全面而生动的革命历史画卷。

史料仍然是历史的基础。旅英学者李丹阳以非常熟悉的李汉俊相关史料为例，通过详细对比各个版本的中译史料以及外文原档，指出国内有关李汉俊的叙述存在不少错译与错判的问题。结合档案和回忆，她认为，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李汉俊始终主持中共临时中央的工作。此外，对于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史料，李丹阳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对于史料搜集工作而言，在明确课题以后，需要缩小对象与范围，不能漫无目的搜集。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尤其注意准确性，有时因为表述不同，原档文字难以弄清，此时需要研究者仔细鉴别。对于研究者而言，原始档案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不能过于迷信，而是要通过多种史料周密分析考证后才能下结论。

基于史料,论文集中的多篇论文对不少原有和新近的观点进行了重点分析。吴海勇指出,7月1日被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纪念日的背后,是毛泽东基于现实的睿智决策和敏锐洞察。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接触到相关历史文献,影响其决策的是复杂的历史情境。李云波梳理了关于中共“一大”闭幕日期的种种说法。邵雍则对新近提出的“中共一大闭幕于8月3日”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颇有一片生机勃勃的态势,其原因之一便是“新革命史”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新革命史提倡回归历史学轨道,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尝试使用新的史料、意识和方法,以求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受此风潮带动,一批新的党史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在我们这本论文集中,多篇人物研究的文章呈现出了这一新气象。

姚霏的《丁宝琳:中共发起组里的神秘女性》一文将焦点集中于丁宝琳这位中共发起组内的神秘女性。作者通过还原其从最初作为进步女性参加革命活动到最终为情所困出家的曲折经历,为我们展现了早期革命者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展现了长久以来被传统革命史学所遮蔽与忽视的“边缘人物”的历史图景。

江文君、张姚俊、张玉菡等学者虽然依旧将陈望道、沈雁冰、王尽美等著名建党人物作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相比过往传统革命人物研究,做到了:在挖掘人物生平之余,注意人物的心态与心理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发现新材料;注意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早期文人参加革命,其政治心态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如江文君对以往隐去不谈的陈望道脱党一事进行了还原,认为其脱党除去个人理念的原因外,还有党内人事斗争的因素;张姚俊则指出了沈雁冰对中共建党的具体贡献,特别是其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对“一大”党纲的起草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张玉菡则注重勾勒王尽美的出身背景,这与以往的标签化叙述明显不同。

人际关系和地缘关系作为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概念,也出现在本次论文集中。李璘的《渔阳里时期陈独秀交往述论》,详细讨论了陈独秀在沪期间形成的独特人际关系网对中共建党的影响。高红霞与刘盼红合作的论文《湖北人与中共建党》则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何以湖北移民人口稀少的近代上海,湖北籍党员的数量却相对较多。

大量建党历史人物活跃于上海这片土地,有着强大的时空逻辑。中国共产

党诞生在上海，其早期的主要活动也集中于上海，因此，上海是红色文化的诞生地。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上海的主流文化是海派文化，而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则是以江南文化为主流。此前，对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系，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集中，熊月之教授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是相关领域的重大突破。

熊教授在文中探讨了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他认为，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展、重视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特点在海派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红色文化则是在上海特殊的城市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滋生、发展而来的上海文化基因。据此，熊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上海红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鲜艳、灿烂、繁盛，是与海派文化中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分不开的。因此，上海不仅仅用自身的空间承载了中共大量的革命活动，也用自身独特的海派文化，孕育出了红色文化，是当之无愧的“党的诞生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红色基因伴随着这座城市成长的各个历史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上海市区内大量存在与革命活动相关的红色纪念地。截至2017年底，上海已经认定650余处革命历史遗址和遗迹。在此基础上，上海师范大学团队近年进行深度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形成更为完整和丰富的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1000处革命纪念地。此次研讨会公布的红色纪念地名单较为完整展现了与革命相关的名人在沪的故居、中共特科和地下党在沪活动点、革命书籍印刷和出版书店、新四军在沪活动地的分布，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对上海城市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将原先相对孤立的部分地点连接成完整的红色文化面。除去从文献中挖掘了更多信息，这次红色纪念地名单在内容上也下足了功夫。每处纪念地都经过实地探访和考察确认，广泛征询老上海市民的口述认证，并与史料互证。同时，这些革命纪念地的时空信息准确，可以做到用历史地图和GIS技术精准定位，具备互联网发布的基础。新考订出的红色景观中还加入了历史图片或摄影图片，增加了公交、地铁线路信息，希冀更为直观地展现红色景观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尽可能方便公众的参观访问。

未来,我们会将纪念地的图文信息集结成《日出东方——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同时,我们也将以成果嘉惠社会。我们建议,对于重要纪念地,有必要继续建设纪念馆、博物馆;在纪念地保护工作中,应丰富完善多姿多彩的纪念性铭牌;对已消失的建筑,可通过二维码+手机 APP 再现历史信息和场景;此外,还可加大红色纪念地的跨省联动。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高峰高原学科负责人,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研究会副会长)

目 录

序言：追忆建党先贤的上海事迹	苏智良/001
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	熊月之/001
塔拉索夫不是维经斯基	李丹阳/015
毛泽东确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纪念日的历史情境还原	吴海勇/020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陈独秀	郭绪印/033
从伶仃洋畔到黄浦江边——杨殷与上海的两次交集	徐 明/047
走向革命：中共“一大”前王尽美成长研究	张玉菡/053
陈望道与中共建党	江文君/066
刍议沈雁冰早年的革命活动与中共创建	张姚俊/085
杨明斋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贡献	陈安杰/101
上海外国语学社述略	邵 雍/112
湖北人与中共建党	高红霞、刘盼红/124
四川第一个党组织之创建始末——中共成都独立小组	焦敬超/135
丁宝琳：中共发起组里的神秘女性	姚 霏/148
上海平民女校与资源动员	丰 箫/158
叙论瞿秋白在上海革命活动轨迹	翁长松/169
中共“一大”会议闭幕日期研究述论	李云波/180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日期再考 ——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	邵 雍/197
海内外档案的收集、鉴别、翻译与解读 ——以有关李汉俊的档案为例	李丹阳/202

江南文化^①、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

熊月之

明清上海本是松江府属一县,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之中。近代上海移民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直接的渊源。近代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欧美文化的某些因素,经由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集聚、熔铸、升华而成的都市文化。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系,一如树木之于土壤。

一、江南文化对海派文化的奠基

六朝以后的江南^②,特别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

①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各时代含义、范围有所不同。本文沿用李伯重、范金民、陈国灿等人的概念,即大体上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明清时期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府,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及清代雍正年间从苏州析出的太仓州,凡八府一州。这一地区亦称太湖流域,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陈国灿《江南城镇通史·总论》,《江南城镇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当然,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域、经济区域有联系又有区别。行政区域有明确的地理边界,经济区域受自然禀赋与物产等因素限制,也有相对稳定的边界,文化区域的边界则相对模糊些。研究文化区域,必须考虑到流动中的人的因素。比如,白居易、苏东坡就籍贯而言,都不是狭义的江南人,但是,他们在江南有诸多活动、作品,讲文化江南少不了他们。清代陶澍、林则徐都不是江南人,但是,他们长期在江南为官,有很多重要建树,直接参与、影响了江南文化的发展。唐甄、魏源都不是江南人,但他们长期在江南一带生活,研究江南文化也少不了他们。按照小江南的定义,李渔是浙江兰溪人,算不上江南人,但是,他长期在杭州、金陵生活,研究江南文化也不能忽略他。这些曾经在江南生活的官员、文人,即使离开了江南,江南文化在他们身上依然有所表现与影响。所以,江南文化的边界呈网络状。这个网络以江南地域为核心,以在这一地域活动的人的流动为连线,向外扩展。

② 关于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学术界原先一般认为时间在唐朝中后期,现在较新研究成果表明,这一转移在六朝的宋齐之交之际已经实现。见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转下页)

区,在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方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其一,民性聪慧、灵活而又刚毅、坚韧。

江南气候温润,山川秀美,水域众多,河渠纵横,人民钟灵毓秀、聪慧灵活。六朝以后,中国北方人口持续南移,人民治理水患的能力大为增强,江南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利用,逐渐成为全中国经济重心。江南文人作品,包括诗词、文章、书画,每每表现出秀丽、婉约、轻灵、善变等特点,与齐鲁的儒雅、敦厚,燕赵的刚直、豪爽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在长期的与江河湖海搏风击浪的斗争中,江南人养成勇敢、刚毅、坚韧的品性。魏晋以后,尽管江南上层社会普遍崇尚文教,但下层民风还是剽悍刚强。江南诸多文人表现出来的豪迈、旷达、洒脱之风,如东晋王羲之,唐代骆宾王、贺知章、张旭,明代徐光启、杨廷筠、陈继儒、陈子龙等,其实是刚毅、坚韧特性的变形。

其二,崇文尚贤,重视教育。江南自然资源禀赋卓越,其地人民谋生较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便特别重视精神生活、重视文化。东晋以后江南士族多以文才相尚。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才华横溢,能诗能文。唐宋以降,崇文重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江南寺庙林立,宗教文化昌盛,是江南人重视精神生活的突出表现。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科举考试中,江南人成绩最为优秀,状元、榜眼等多出于这一地域。科举考试之外,凡与文相关的方面,文赋诗词、书法、绘画、音乐、雕刻、园林,江南均很发达。

其三,重视实践理性,发展商品经济。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比例。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有所不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已有粮食、棉花与蚕桑产区的专业分工。粮食产区面积最广,涉及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常州、镇江七府,棉花产区以松江为主,蚕桑产区以湖州为主。蚕桑区的中心是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四府交接地区,尤以湖州的乌程、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茶、麻苧、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甚至植桑与养蚕也有分工。乌镇曾有远近闻名桑叶市

(接上页)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参见李凭:《六朝的历史地位》,载薛峰、储佩成主编:《齐梁故里与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

场,有些农户从养蚕产业链中独立出来,专门种植桑树、生产桑叶、运输桑叶、销售桑叶而不养蚕。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丝织、棉纺、陶瓷、制糖、酿造、造纸、矿冶、五金等,各有专家。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士大夫多兼农桑之业,亦农亦商、士商一家的情况相当普遍,商贾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①。对于宋代以后商人地位的变化,清代沈垚说:

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贍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②

与商人地位提高相一致,一些读书人也比较注重治理生计。常州著名绅士赵翼辞官回乡以后,便开设当铺,置办鱼塘,出租土地,很会治理生计。常州的庄家、恽家等缙绅大族,没有一家不讲究实际、不注重生活质量。大学者顾炎武也是理财好手。他四处游走,每到一处,都很注意那里的土地问题,发现什么地方有开发价值,就在那里投资垦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去经营,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寻觅新的发展空间。在江北的淮安、山东的章丘、山西的雁门之北、五台山的东面,他都垦过田。海宁人陈确(1604—1677)明确认为,学者都应该懂得治生,读书、治生是“真学人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③。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1页。

② 沈垚:《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转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0页。

③ 陈确:《陈确集》卷3,中华书局1979年版。关于“治生”问题,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有详细讨论(见《士与中国文化》第八章),其中所引论述治生重要性的学人,如沈垚、陈确、唐甄、陆楫,多为江南人,唐甄是四川人,但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苏州。

对于这方面,无锡人钱泳(1759—1844)有两段话,很能反映他们义利兼顾的心态:

银钱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则难于运用,少则难于进取。盖运用要萦心,进取亦要萦心,从此一生劳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随之衰惫。须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撑节以经理之,则绰绰然有余矣。^①

商贾宜于富,富则利息益生。僧道宜于贫,贫则淫恶少至。儒者宜不贫不富,不富则无以汨没性灵,不贫则可以专心学问。^②

这种财富观,相当实在,既不是唯利是图,也不是耻于言利,而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

其四,重视实学,分工细密。重视实践理性的,必然重视实学。这里所说的实学,主要指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之学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在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之学方面,明清两代江南学者都相当突出。明代东林党人的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江南读书人关心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长期居住在苏州的唐甄(1630—1704)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清代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方面,江南学者成就很高。晚明时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地理等,中国兴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徐光启(1562—1633)、杨廷筠(1557—1627)、李之藻(1566—1630),这三人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徐是上海人,杨、李是杭州人。他们没有因为那些学问来自西方,就漠视、轻视甚至仇视,而是认真分析,虚心学习,意志坚定。其中,徐光启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众多西书,编写了《崇祯历书》等书,涉及天文、历算、数学、地理、物理、哲学等方面。他提出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③,是对待西方文化最为大气、理性的态度,代表了当时中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最好水

① 钱泳:《履园丛话·臆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3页。

② 同上。

③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载王重民辑:《徐光启集》卷8,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74页。

平。李之藻在引进西学方面的影响,仅次于徐光启。他与传教士合译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名理探》《寰有诠》等著作,在西方数学、地理学、逻辑学输入方面,贡献甚大。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跟着这一传统下来的江南学人,最著名的是王锡阐(1628—1682),吴江人。西洋历法传入以后,朝廷、学术界聚讼纷纭,几番讨论。王锡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仔细验证,历时三十年。正因为有此一丝不苟的精神,他发现、纠正了西方历算学的一些错误和不精确之处。笔者对明末以后科技学者的分布情况做了一个统计:阮元等人所编的《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 220 人,籍贯确切可考者 201 人,其中江苏 75 人,浙江 44 人,安徽 32 人,江西 12 人,其他省份均不超过 10 人。^①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而密集。

江南学者重视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注重到社会现实中做调查研究,从调查中获取、验证、修正知识。在这方面,徐霞客(1586—1641)、顾炎武与顾祖禹最为突出。徐霞客历时三十多年,不畏艰辛,不顾危险,到全国各地旅行考察,留下极其丰富的实地考察资料。他以科学精神治地理学,一切以实测为基础,前无古人!顾炎武之治学,有一半时间在各地旅行,考察、观察。他旅行时,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另外用两匹骡子驮着书籍和日用品,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就到坊肆中将行李打开来,进行对照、修改。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等名著,都是这样一边考察一边修改出来的。他在《日知录》中讨论制度、风俗等内容,很多是调查所得。无锡人顾祖禹(1631—1692)著《读史方輿纪要》,历时 21 年,十易其稿,他的方法与顾炎武一样,将考察实践中所得资料,与文献对照,“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②这是道道地地的科学精神。这部书被当时学者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作”。梁启超认为此书在研究方法上是“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③。

重视实学,必然重视日用技艺。明清时期,江南读书人特多,但科举考试录

① 见拙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9 页。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 2005 年版,总叙二。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2 页。

取名额有限,大多数富余读书人将精力投放到日用技艺方面,专精一技,专擅一长。专精一技,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诚如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①那篇日后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玉器、牙雕、红木雕刻、竹雕、石雕、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在江南都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其五,注重物质生活,讲究物质享受。与经济发达相伴而来的,是江南人讲究物质生活。唐宋以后,江南人相当讲究物质生活。明清江南人讲究排场,追求新奇,已是普遍现象。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对庶人服饰做过很多规定,包括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等,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不许用金玉珠翠等。但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早已冲破朝廷规定,一改布素而追求绮罗锦绣,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

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不好事,此在富贵人中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贱役长年、分止布衣食素者乎!余乡二三百里内,自丁酉至丁未,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②

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女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余对湖州太守陈公幼学曰:近日老朽改古诗一首。太守曰愿闻。余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③

服饰的纹饰也出现了团龙、立龙等龙形纹饰,逾越名分。妇女的饰物,首饰以金银为美,镯环必珍珠宝石,以贵为美,以多为胜。富裕人家如此,贫苦人家也被卷入这个潮流,“不论贫贱富贵,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④。范濂曾说:“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⑤胥吏、屠贾、倡优等下层人士竞相效尤。时人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

① 《袁宏道集笺注》卷5,见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② 李乐:《见闻什记》卷10,见张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③ 同上。

④ 钱泳:《履园丛话》卷7,骄奢。

⑤ 范濂:《记风俗》,《云间据目抄》卷2。

新色新样，“间有老成不改布素者，则目指讪笑之”^①。

饮食方面，明初还比较俭朴，到明中后期，奢侈成风：“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②城市流行在戏馆宴客，“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③。“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遄，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也，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倾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彘狗不能食”。^④

在这种讲究吃穿、追求享乐的奢侈风气中，上海地区也不例外。自宋以来，上海地区除了个别时期，或因倭患，或因闭关，商业受到影响，风气由奢向俭稍有敛缩，绝大多数时间里，风俗崇素黜华。据记载，在明代中后期，上海风俗由俭入奢。崇祯《松江府志》称：“吾松正德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云间据目抄》称：

吾松素称奢淫黷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好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⑤

特别是清代康熙以后，海禁开放，贸易兴隆，粤闽晋商帮寓居上海，衣必华鲜，食必精细，日日酒宴，夜夜笙歌，夸富斗豪，愈演愈烈。

在这种讲究物质生活的奢侈风气中，上海地区的人似乎走得更远，想得更深。最典型的是明代上海学者陆楫，他专作奢侈有益论，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从一人一家而言，崇俭自是美德，“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崇俭则未见得有益。因为，没有繁盛的消费，就不能刺激兴旺的生产，没有兴旺的生产，必然影响大众的生计。他的结论是，传统的崇俭恶奢观念并不完全正确，

① 黄印：《备考上·风俗变迁》，载《锡金识小录》卷1。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

③ 顾禄：《清嘉录》卷7，青龙戏。

④ 钱泳：《履园丛话》卷7。

⑤ 范濂：《记风俗》，《云间据目抄》卷2。

禁奢崇俭并不能使民富裕,而奢侈倒能促进经济繁荣,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①这种见解,不但在江南,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也是空谷幽兰,极为罕见、珍贵,有学者认为它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曼德维^②的观点相似。

其六,勇于挑战传统,张扬个性自由。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南方“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舒”^③。明清江南挑战传统纲常名教、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吴县人冯梦龙创作改编“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乌程人凌蒙初整理编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浙江兰溪人李渔写《十二楼》等一批言情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期艳情小说多出在江南,在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④。这些小说谈吃穿、谈情色、谈游玩、谈雅好,所表现的思想、情趣、格调,与官方倡导的东西大异其趣,也是对官方倡导的压抑人性的意识形态的反弹。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表明,江南盛行艳情小说,与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民情风俗有内在联系,作者主要是江南文人,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主要在江南,如扬州、苏州、杭州,“这些地方自明代中期以来工商业特别繁荣,是盐业、纺织业、铸造业、图书业的中心,而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在秦淮河及南运河两岸的歌楼画舫应运而生。这些地方是富商大贾积聚之处,市民力量较大,封建统治相应地薄弱,风俗趋于淫靡,逐渐形成春画与艳情小说的发源地而向全国扩展。清代严禁淫书淫画便是以这一带为重点清查对象的”^⑤。

以上六点,综合反映了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

① 陆楫:《蒹葭堂稿》卷6,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639—641页。

② 曼德维(Bernard de Mandeville, 1670—1733)认为:“在蜜蜂的社会里面,罪恶与奢侈,若是行着的时候,这个社会就非常之繁荣;若是代以道德和简易生活,他们的社会,就不能不衰微了。”见张荷:《吴越文化》,第174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④ 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序》,见凌濛初原著,即空观主人评点:《二刻拍案惊奇》,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页。

⑤ 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